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1-13

齐鲁晚报

2020年3月21日

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 编辑：美编：
曲鹏 红

八十年代的号角

今天重读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会让人很难相信，这样一本薄薄的册子，居然曾经掀起了全民现象级的“柏杨热”。

《丑陋的中国人》甚至算不上一本完整的书，内容是演讲、杂文、谈话的汇编，松散随意且多有重复。柏杨用通俗的语言，重重抛出了一个概念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，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，他将中国文化的这种弊端概括为“酱缸文化”。一切非正义的、伪劣的、凶恶的、丑恶的、丑陋的东西，都源于它。

今天，我们管“酱缸文化”叫国民性，也就是鲁迅说的劣根性。

国民性是文化学最深层的问题之一。柏杨没有像鲁迅那样，将国民性写入小说，而是通过杂文的笔法，单刀直入地摆在世人面前。他在写这些文字时，没有遮拦，实话实说，痛快犀利，不加任何修饰，像一面闪闪发亮的镜子，照得人无处遁形：每个人把自己好好看清楚，哪儿脏哪儿丑，想想该怎么办。

被人指出丑陋之处的滋味不好受，想让温水里的青蛙发现自己的尴尬境地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
整个二十世纪，并不缺少善于反思的人，但是这些文化反思的出发点，大多还是站在传统的基础上，没有跳出圈子。这正应了那句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柏杨却做到了，所以当“酱缸文化”到来的时候，社会反响会那么大。

其实，“五四”之后，批判国民性并不是个新鲜话题，从内容上看，柏杨没有比前辈们高明多少。但是，“酱缸文化”出现的时机巧妙，在现代化反思中人们最迷茫的时候，瞬间触发了一种集体性的情绪。

不狠不痛，焉能触动。柏杨很干脆地告诉大家，中国人的丑陋，就存在于每个人自己身上。这是全新的角度，启迪大家反思自己、反思传统。柏杨的“耳光”，为打碎传统文化助了一臂之力，他加速了破旧立新的进程。

任何国家和地域的集体性格都有劣根。指出劣根，并不意味着否定优根，否定一个民族。“揭示劣根，剪除劣根，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优良的根性。”作家冯骥才说。

柏杨是思考者，但还不算思想者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，柏杨的批评是“世俗批评”。他不同于大多数知识分子，不是在民族国家这个大层面上进行文化批判，而是在一个世俗社会，聚焦于老百姓的生活世界。

柏杨的文章里，关注的是吵、闹、脏、乱、不团结、窝里斗、热衷于谎言、不允许创造性思维、随地吐痰、闯红灯等现象。逢年过节请客送礼、居家伦常、长幼尊卑、邻里关系、社会规则、忠孝节义、宽容嫉妒、恩情仇恨，也是他经常批判的主题。

他期望中国人能摒弃陈规陋习，普遍拥有现代人的文明行为和公共道德，这种批评总让人读了过瘾而不解渴，抑或过于琐碎。

当然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价值。作为一名探路者，他已经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

讲历史故事的他

中国落后，他批评中国的国民性，而国民性的塑造源于中国历史。这是柏杨的逻辑，所以他在晚年花了大量精力去写历史读物。

读史使人明智，柏杨对文化的思考，本就是来自于对历史的认知。

1920年，柏杨生于河南辉县。少时受继母虐待，17岁时离家出走。天津、沈阳、北京、济南、青岛、南京、上海、台湾，柏杨用双脚画出了一张“流浪地图”。

人生的磨练并未从此收场。1968年，因为一幅漫画，柏杨顶着莫须有的罪名，蹲进了台湾当局的监狱。在那里，陪伴他的是监狱图书馆里的那套《资治通鉴》。

十年牢狱生活，他蹲出了三部历史书稿：《中国历史年表》《中国历

读完他的作品能够平心静气的人，世上大概是不存在的。

“一个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，运转起来之后，身不由己。”柏杨不甘心做那样的石子，也不希望每一个身体走进现代社会的人，脑袋里还装着陋习而不自知。

今年是柏杨诞辰一百周年，读书界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，他的杂文特别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被再一次解读，36卷本白话版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也于近期出版。回头看看，柏杨是不完美的，甚至是不那么优秀的。尴尬的是，他依然无法被彻底束之高阁，丢进档案库。柏杨在褪去光环、回到“常温”后，他留下的东西，却难言过时。

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回归 变凉的柏杨 还难言过时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



代帝王皇后公主世系录》《中国人史纲》。恢复自由之后，他依旧对《资治通鉴》心心念念，将这部400万字的文言文古籍，改写成了人人都能读懂的白话版。

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。可惜的是，即便在司马光那个时代，也没有几个人能耐着性子，看完卷帙浩繁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
“让人人能读懂”，是个多么宏大的心愿。当年，司马光身在体制内，又有皇上圣旨加持，经费和人员充足，耗时19年才完成了《资治通鉴》。而柏杨是以一己之力和简陋的条件在从事翻译，抒发自己的史观。

从64岁译到73岁，虽没有在黑牢里那种“甲尽血出，和灰成字”的悲凄，但翻译《资治通鉴》十年，是柏杨的另一个“十年牢狱”。

他的妻子张香华女士回忆：“柏杨在着手翻译这部《资治通鉴》时，我们还没结婚，到他完成72册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时，我儿子中已经上了小学。我记得，他一个字、一个字翻译，案牍劳形，翻书阅卷，真够壮烈。”

功夫没有白费。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面世后，便引起了轰动。据

统计，早在2011年，这部巨著的发行量已超过1000万册。今年是柏杨诞辰100周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，可见它依旧有市场、有活力。

严格说来，这不是一部真正白话版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柏杨也不是一个“老实”的翻译者。它的骨架是司马光的，但是血肉是柏杨的。柏杨以《资治通鉴》为本，进行再加工再创作，写出了浓郁的柏杨味道。

对此，柏杨并不回避。中国历史的长河壮阔曲折而浩浩荡荡，在改写的过程中，他“把记录的历史事件仔细过一遍”，用现代民主的思想来分析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引发的后果，“注入我个人的观点”。

写小说十年，写杂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写历史读物十年。苦难没有让他停下手中的笔，而是加速了他的思考。

历史不是某个人的专利，柏杨当然有权利、有实力去读历史、讲历史。司马光当年写《资治通鉴》是给皇帝大臣看的，而柏杨改写这部白话版是写给今天的官员与老百姓看的。柏杨的心意是“让他们看到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正气，什么是封

建专制的血腥镇压，以及奸恶之徒的诡诈与伪善，并让读者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与人生得益”。

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似乎叫《柏杨讲资治通鉴故事》更合适，专业人士可以从中轻易找出翻译错误、随意改动文字、杂糅史料、阐发不合理的现象。但是这部“柏杨讲通鉴”的市场魅力，依旧是巨大的。这意味着，新一代的学者、作家、翻译家们想超越柏杨，还有很长路要走。

做有尊严的中国人

别看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指责中国人的丑陋，柏杨的骨子里却是爱国的。

《中国人史纲》第一章，有段像诗一样的文字：“中国版图像一片和平宁静的海棠叶，台湾岛和海南岛，像镶嵌在叶柄下方的两颗巨大珍珠，南中国海诸岛，则是无数散落在碧绿海水中的小珍珠群。”这就是柏杨心中永远的家园印象。

“崇洋，但不媚外”，柏杨所欲也，他从不掩饰自己的“崇洋”。他直言，一说起别国的长处，就有人嚎叫说“崇洋媚外”。“事实上，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日本，他们有好的，我们就应该学；他们不好的，就不应该学，就是这么简单明了！”

他所谓的崇洋，是指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及西方文明进步的思想文化观念，这与鲁迅当年提倡的“拿来主义”是异名同质的。

柏杨说，如果希望像美国一样强大，我们就需要向美国人学习，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。“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，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。但我们也应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，假如美国是那样，他就僵化了。”

崇洋的目的，还是为了中国变得更好。柏杨认为受人尊重的前提，是拥有反省自己的能力，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最大、最基本的要件。“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，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。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，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，后果都一样。”

柏杨后来写文章一直强调中国人要讲尊严，他批评丑陋的中国人，前提是怀着“有尊严的中国人”的理想，这与今天讲的文化自信、民族自信如出一辙。

自信的前提是自强不息，更是自爱、自律。在陈晓明看来，道德品性、价值观、行为规范、公共道德意识等方面，中国人都应该有更高的期许，对自我有更高、更全面的塑造。“我们今天经常读一读柏杨先生的杂文，也是对我们的一个重新敲打。”

步入新世纪、新千年，柏杨不像原来那么热，甚至有些凉了、冷了，可他笔下“丑陋的中国人”依然还在。

中国人的钱包鼓起来了，物质带来的自信，使我们难免内心膨胀，似乎什么丑陋不丑陋早已是过去式。然而，物质的富足，并不意味着在文明上会相应进步多少。

揣着“买遍全球”的豪情壮志，多少人带着吵闹和不洁走过全世界；走遍中国的大城小镇，会碰到千篇一律的丑陋建筑和神情不安、内心焦虑的人群；闯红灯、随地吐痰、高价彩礼等陋习，不时还能见诸报端……这样的中国人，还算不上是“有尊严的中国人”，还不足以让地球村的其他伙伴们，打心底里尊重。

我们依旧需要反思。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，总要不断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，不管是穷是富。贫富不是文明的标准。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，大国公民也要有大国公民的做派，而这种改变首先要靠自省。

正如柏杨所期待的：“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能认清我们的缺点，产生思考的一代，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、变薄，甚至变成一坛清水，或一片汪洋。”

在柏杨的书房，有个“297”的门牌号，那是他在牢中的编号。柏杨把写作的书房命名为“297”，意味着他把写作当成是一种苦修。

对“酱缸文化”的批判，对国民性的反思，又何尝不是每个现代人面临的漫漫苦修？